

百年文言

陳永正題



編主 陳永正 徐晉如

浙江古籍出版社

陳永正題



百年文言

編主 陳永正
徐晉如

副主編 許紹鋒
黃悅
鄒金燦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百年文言 / 陳永正，徐晉如主編；許紹鋒，黃悅，鄒金燦編. —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540-0324-4

I. ①百… II. ①陳… ②徐… ③許… ④黃… ⑤鄒… III. ①古典散文 — 散文集 — 中國 — 近現代 IV. ①I26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214562號

百年文言

陳永正 徐晉如 主 編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347號 郵編：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路 偉 潘丕秀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校對 余 宏 吳穎胤

責任印務 樓浩凱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張 36.75

字 數 582千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540-0324-4

定 價 158.00圓（精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後期資助項目

前言

一

二十世紀初葉，一場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席卷中華大地，其核心是白話文運動，「提倡白話文，廢除文言文」，號召要徹底打破文言的束縛，以語體文取代通行了一千多年的文言文。這是一場顛覆性的文化革命，文言遭到前所未有的厄運。

新文化運動先驅者胡適說：「中國二千年來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這都是因為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祇有些死文學，祇有沒有價值的死文學。」後來成為古典文學研究專家的俞平伯認為，文言文作品「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昏昏欲睡」，新文學家陳西滢把文言文、古琴等都看成是「已經僵了的化石」，「應該加以掃除的腐朽物」。

新文化人士所持的是極端的二元論：白話與文言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雙方，「新」與「舊」的對立，「今」與「古」的對立，「俗」與「雅」的對立，「質」與「文」的對立，「進步」與「落後」的對立，「人民群眾」與「貴族精英」的對立。一切「新」的，都是進步的，光明的，有著無窮前景的；一切「舊」的，都是落後的，黑暗的，走向衰落死亡的。求變求新，破舊立新，成了顛撲不破的真理，天經地義的大任。新舊之辨，也成了真偽之辨，美惡之辨，優劣之辨。舊的，必須徹底打倒和消滅。更嚴重的是，在那個敏感的時代，文化上的一切論爭都被看成是政治鬭爭，白話與文言之爭也就成了革命與反革命之爭，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鬭爭。到最後，「新文藝摧毀古文，新文化打倒禮教」，白話文終於完成一統天下的大業，幾乎是全面地取代了文言。

這種激進主義的思潮，近百年來，愈演愈烈，給整個社會文化帶來極大的危害。革文言的命，革詩詞的命，革國畫的命，革京劇的命，革古琴的命，革中醫的命，革一切舊文化的命。直到「文革」的狂飆激蕩，神州舊物都成了飛灰與瓦礫時，人們纔猛然警覺，可是已太遲了。頹圯的殿宇可以翻修，焚毀的典籍可以重印，而世道人心的崩壞卻是難以彌補的。

如今，對傳統文化鳴鼓而攻的時代已經過去，白話文早已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成為全社會的主流書面語言，人們再也無須擔心文言的「復辟」了。當代學者開始反思，在檢討白話文運動功過的同時，也重新審視文言文的歷史意義和存在價值。

文言，源於春秋時期的「雅言」。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古代貴族士人，均以雅言交際；異域殊俗，亦以雅言互通。雅言，即「正言」，當時華夏民族的典範語言，經典中使用的文言文，也就是這種共同語的書面語。文言是口語的提昇，自然要比口語精美得多。孔子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可以使「言」更充實，有了「文」的「言」，纔能書之竹帛，傳之久遠。文質兼備的文言文，一直是中國歷代知識精英共同選擇的最佳的文化載體，是當今世界上使用時間最長的書面語。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文言文是一種完善、完美的文體。它是超穩定的，時移代易，文體體系不斷演化，各種體裁，各種流派，雜遝紛呈，萬變不離其宗，文言文的整體語言結構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二千多年來一直保持著恆定的形態。先秦時的左傳、論語，馴至清末的桐城文字，語彙、文法上都沒有太大區別。這種超穩定性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續，文化得以傳承的重要因素，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文言文也影響到同屬漢文化圈中的周邊國家，百十年前，中國人還可以用文言與日本、琉球、朝鮮、越南的官吏及文人筆談。

文言文，是歷史文化的命脈，文學的正宗。梁啟超說：「文言文行用已經兩千多年，許多精湛的思想，優美的文學作品皆用他來發表。」莊子崇尚自由的精神，儒家以仁義禮樂教化天下的思想，是用文

言表達的：絕世風華的唐詩宋詞，是用文言創作的。五千年歷史長河中朵朵浪花，都是由文言盛載起來的。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對中華文化的凝聚，文言文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作為炎黃子孫，我們怎能不深深感謝它的恩賜呢？在今天，無論從感情上或現實意義上，都不該逐末忘本，將文言文視為糟粕，棄如敝屣。

首先要思考的是，文言文是否像庸俗社會進化論者所說的那樣，是「舊」的「死」的語言文字。

一切文學藝術形式，包括文言文在內，都是「器」，作為載體，無所謂新舊之分，優劣之別。文學不同科學，藝術不同技術。科技也許需要不斷創新，不斷進步，而文藝形式，無論新與舊都有其存在價值，絕不能說西洋抽象畫要勝過國畫，東洋式現代書法要勝過傳統書法，話劇歌劇要勝過京劇。

吳芳吉說：「文學祇有真偽，沒有新舊。」文學的生與死，並不在於使用什麼語言文字，而在於它本身的內容與藝術是否有存在的價值，內容虛偽、藝術拙劣的當然是死文學，甚至稱不上是文學。一旦文學淪為政治的附庸，成了幫閒文學、遵命文學，那就如糞上之英，朝生暮萎，真的是死文學了，這與是否文言無關。二千年來，死文學絕大多數早被歷史淘汰，能流傳下來並為人們所熟知的優秀的文言詩文，歷久而長新，至今仍葆有活潑潑的生命力。

其實，白話文也不是什麼「新」的東西，胡適所說的「白話式或接近白話的文字」也存在千年以上。他那部白話文學史即可作明證。古代白話，由於它的粗糙、低俗，始終無法登上文化殿堂，成為文學的主體語言。近百年的白話文，在某種意義上，並不是真正的「白話」，也算不上是真正的語體文。錢基博早就指出，「所謂白話文，祇不過是用一種書面語代替另一種書面語」。它既不同於水滸傳、三言、兩拍、紅樓夢中的舊白話文體，也不等同於當時的口語。它是為反對傳統文言文而製造出來的特殊文體，是現代口語與西式語法及部分文言語詞、日式漢字詞彙的混合物，經過新文學的努力探索、實踐纔逐漸成型，直到今天，以現代漢語為載體的白話文纔漸趨成熟。白話文學，包括新詩，至今尚未能形成一個新的傳統，它所取得整體成就遠不足以與文言相比。

正因如此，現代白話文也遭到左翼人士的詬病。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有學者把現代白話文稱為「新文言」，是資產階級文人製造出來的「死的白話」。他們主張「語言和文字絕對一致」，用「大眾語」取代「白話」。多年來，社會上已形成一種似是而非的共識，以為大眾語言源於生活，是最豐富多彩的，而知識分子則語言乾癟，必須向民間學習。筆者有過十多年的下鄉下廠的經驗，深深體會到，文化程度愈低，思想則愈貧乏，所掌握的詞彙量則愈少，語言則愈枯燥無味。在草根階層中，即使偶有精彩的語言，也祇屬於其中有文化教養的精英分子。語文專家呂叔湘給文言和語體的區別找到一個簡單的標準：「能用耳朵聽得懂的是語體，非用眼睛看不能懂的是文言。」書面語要讓所有人真能聽懂，恐怕連「大眾語」也不可能完全做到。

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已延續百年，這是一個舍雅求俗、棄精取粗的全過程，如劉再復所說的，「在一百年當中，中國文學作為語言現象，是一個不斷俗化、不斷把文學語言降低為現實語言的流程」，到了五十年代，「文學的俗化已發展為文學的極端政治化」了。

白話文，本身就承載著不少民間暴力語言，白話文運動，也滋長了語言暴力。當時盛行的「打倒」一詞，竟成了數十年來使用頻率極高的社會習慣語。當通俗化、粗鄙化到了極端的時候，舉世皆以愚賤為榮，以「大老粗」自我標榜，端莊的舉止、高雅的談吐、優美的文辭也成為批判對象，美德遭到踐踏，人格日趨卑下，終於出現「砸爛狗頭」一類的流氓黑話了。暴力語言挾同著暴力行為，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劫難。近二十年，隨著經濟的勃興，拜金的教義驅使文化進一步媚俗，流行文化成了主流文化，八十年代曇花一現的審美覺醒和精神超越的需求已蕩然無存，大量的垃圾文字如垃圾食品那樣滋養著群眾。在網絡時代，點擊率成了衡文的最高標準，網上流傳的文字，低俗化的傾向尤為嚴重，鬧嚷嚷的卑田院式的狂歡，沒來由的語言群毆，黃段子、灰段子、黑段子的熱擊，螢幕充斥著大量的暴力語言，連學者、教授的微博爭辯，也粗野得如同潑婦罵街，古人那種即使絕交也口不出惡言的風範，於今再也不復見了。語言的墮落，也就是文化精神的墮落，這不能不說是整個民族的悲哀。從民間產生的

網絡語言，自有其草根性的蔓延力量，但當它直接影響到知識分子，並左右其對語言核心價值判斷的時候，就值得我們警惕了。

文言文與白話文，本是二元一體的關係。兩者同出一源而並流，共同滋溉著文化的土壤。提倡白話文，也不需要廢除文言文。梅光迪認為「古文與白話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之變遷，尤非革命也」。最初，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傳統文人，有過設想，以為可以實行雙軌制，即在新聞、科技等領域使用白話文，而文史、藝術等依舊使用文言。白話適於時俗，文言適於典雅，這也算是一種「得體」。蔡元培曾預言：「我也斷定白話派一定優勝，但文言是否絕對的被排斥，尚是一個問題。照我的觀察，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本來，白話文運動的發起者，能客觀一點，寬容一點，白話文可占領政治、經濟、自然、科學等領域，而文史和藝術這小半壁江山，與文言文分享，各司其職，各行其道。文言與白話，並不是敵對關係，而是兄弟關係，分了家後還可相互扶持，共同發展。同氣連枝，合則共榮，離則兩損。莊子寓言云：「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何況「本是同根生」的文言與白話呢？可惜，事情發展並未如蔡先生設想的那樣，文學革命的暴烈行動太徹底了，文言文由主流驟變成小小的支流，逐漸源頭枯竭，最後，祇剩下一股微弱的湍流，再也流不到地面了。尤其是五十年代後，在中國大陸，文言更慘遭滅頂之災，甚至連一些本來已進入知識階層以至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文言詞彙，也被認為是代表剝削階級意識的腐朽東西，受到批判和抵制。近年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下，在網絡、段子中，文言成語遭到竄改和「惡搞」，真是對語言文字的存心侮辱。

無可諱言，文言也有其局限性，它的語言形式難與現代政治同構，不適合表達科學技術的內容，不可能被所有人瞭解和接受。但這些並非一種文體存在的必要條件。文言文，過去不屬於大眾，今後也不可能屬於大眾。如今，它是一種遺產，一個存在。遺產需要繼承，存在自有價值。文言文，包括以文言文為體的詩詞，並不是死文學，它的發展，百年來不疾不徐，始終堅韌，而風雅一脈正須賴以維持不墜。

二

現當代文言文的生存狀態是很值得探討的文化現象。

新文化運動後，文言文雖退出歷史舞臺，仍未被祛除淨盡，而是在社會各個層面中頑強地生存下來。文言應用場合依然十分廣泛，在官方檔案中，在報章中，文言還占據著主要的位置，民國政府的正式文告也是文言文。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說：「國民黨當國已近兩年了，到了今日，我們還不得不讀駢文的函電，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報，文言的法令。」後來他在報紙文學應該完全用白話一文中又慨歎，當時報紙的文體主要還是文言，他在一九三四年對大公報和益世報中白話與文言所占版面比例作過統計，發現「白話所占篇幅還不到百分之十八」。在今天看來，報紙似乎是全民大眾的讀物，但在那個時代，報紙，主要在大中城市發行，讀者對象為市民。以小商人、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讀者群，尤其喜愛並習慣淺近的改良體文言，不管是否附庸風雅，他們在感情上向慕自己不甚理解的高級文化，並認同文言文的文化價值，試圖去超越自己，連舉止談吐也仿效那遙不可及的知識階層、貴族階層。古人認為，文字是神聖的，連字紙也須敬惜，掌握文字的讀書人是值得尊崇的。尊重文化、尊重知識，早已成為社會大眾的行為準則。這個傳統雖曾受政治干擾而遭到破壞，但人們對文化知識始終還是懷著敬畏之心。

南北各都會以至中小城鎮，文人經常組織雅集活動，文酒風流，唱酬切磋，留下豐富的詩文作品，即如邀約小東、集會序言、詩詞題記等應酬文字，也頗具雅人深致。文友往來信札，一般民衆的家書，都常用文言。由此觀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精美形式的文言文，根深葉茂，已深入社會的各階層，也為部分群眾所接受，非暴風驟雨般的運動所能徹底摧毀。

南北各高等學府中文系多開設古代文史課程，學生研讀古代文獻，熟習文言。中央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暨南大學、安徽大學乃至抗戰期間遷移重慶、成都的各大學中文

院系，不但要求學生掌握理論知識，而且還鼓勵學習文言文及詩詞寫作。中山大學在三十年代是「復古」大本營，中文系主任古直強調師生要讀經，並能作流暢的文言，古典文學內容的畢業論文，更是一律用文言寫作。汪國垣任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新生入系，汪先生就告誡說：「本系力矯時弊，以古爲則。」要求學生能作古文。更值得一提的是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始建於一九二〇年，唐文治任校長，古文家錢基博任校務主任。歷任教師有章炳麟、錢穆、鮑鼎、呂思勉、周谷城、胡曲園、郭紹虞、周予同、陳衍、陳柱、朱東潤、夏承燾、饒宗頤等赫赫有名的學者，而學生中也有以下一些人物：吳其昌、陳中凡、蔣天樞、范敬宜、唐蘭、王遽常、錢仲聯、馮其庸、吳孟復等，後來都成了當代文史研究專家。凡是畢業於無錫國專的都是文言好手。

當時中學語文教學仍以讀文言文爲主，一直延至四十年代末。由於當時大學的入學考試普遍使用文言，也直接影響到中學文言文教育。龔啓昌撰讀了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以後一文評論：「日前看見報上載江蘇省會考試題一律用文言。現在國內各大學的考試，及考試院舉辦的考試，更非用文言不可。」又云：「無怪乎現在的中學生甚而小學生，你不教他文言，他還要求你教他文言。中學、大學入學試驗的影響於學生心理與態度，比了行政機關的一紙號令，或文人的兩三篇文字，不知要大多少。」在這樣的環境下，文言文自然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初等教育，除了政府開辦的正規小學外，更多的是遍布城鄉的各類家塾、學塾，不少人家選擇後者以培育子弟。古代經典是學童必讀的課本，三字經、千字文、成語考等更是慣用的啓蒙教材。一般民衆從小就接受精英文化的教育，其立身行事自然也會受到先聖前賢思想的影響。從現存的文獻資料看來，民間百姓的書信、契據等應用文字，也往往文白夾雜或純用文言，一九三一年張廷華編新體評注歷代駢文精華一書序云：「今者國體變更，文運陵夷，而公私函牘，以此體爲尙。」可想見當時整個社會的文化氛圍，引車賣漿者的言談，也許會比當今某些文化人高雅。

近百年文言文的發展，大致可分爲五個時期：

一、辛亥革命至新文化運動時期（一九一一—一九一九）

辛亥革命後，政體更張，而在文化上卻一仍舊制，文言文繼續保持其主流語言的地位。在這新舊交替的時期，風雲際會，人才迭出，各種不同的政治立場、文學觀點都反映在當時知識精英的文章中，真是異彩紛呈，精美絕倫。民初十年，可說是現當代文言文的鼎盛期。

在當時各種文學流派中，最觸目的當數以梁啟超為首的「晰於事理，豐於感情」的「新文體」派。它的影響遍及社會各階層，竟成為此後數十年間通行的「報章體」。此派文風，純以氣勝，其末流則誇張浮濫，格調不高。

另一重要流派是以革命家章炳麟為代表的「浙江派」。章氏才華洋溢，學問宏深，他的弟子黃侃、汪東都是傑出的學者，黃氏擅駢文，「風骨遒上，辭氣澹雅」，汪東文章茂郁清雄，尤長於辭賦。

南社諸子在革命後極為活躍，高吹萬、柳亞子、陳去病、高旭、朱劍芒等詩文皆擅，然過於重視政治宣傳，總體水準似不如上述兩派。

能維繫文言正統一脈的仍是老輩文人，不少是名高一世的鴻儒碩彥。他們當中有桐城派、湘鄉派的古文家馬其昶、葉玉麟、姚永樸、姚永概、林紓，有專學魏晉文的王闓運、吳虞、馮开，擅駢文的孫德謙、李詳，此外還有嚴復、繆荃孫、馮煦、陳三立、陳衍等一大批舊文人。這些人學問深湛，功力老到，所作文字，皆可以為範式。

二、新文化運動時期至抗戰前夕（一九二〇—一九三六）

一九二〇年，教育部明令以白話為國語，中小學教科書改用白話編撰，這無疑宣告白話文運動已取得最後勝利。

文學藝術是各歷史時期游離主流之外的文化人棲居之地。社會大變動之後，一部分舊文化人選擇了

逃遯。以「大隱」或「小隱」的方式，遯於市井、遯於山林。超然物慾之外，遯入自己的內心深處，成為真正的孤獨者，實現自我封閉式的精神自由，文言文、詩詞、書畫則是文化遺民最後的遯逃之所。這群文人以前清的「遺老遺少」居多，他們是文言文最忠實的維護者，不懂得或不屑於寫白話文，終其一生都用正統的文言文寫作。從藝術角度來看，他們的文章品質最高。

另一批人可稱為「文言改良派」。其中成員成分複雜，大致有以下幾類人：一是提倡「新文體」的梁啟超及其眾多的追隨者；二是革命派人士，包括所謂「浙江派」的章炳麟、劉師培等以及南社成員柳亞子、高吹萬、金天翮等；三是留洋的學衡派人士，中有吳宓、柳詒徵、胡先驕等。這些人在傳統功力的大體不及老輩，主張「改良」文言，主張文字要條達疏暢，但畢竟才人甚多，亦不乏傳世佳作。

此外，還有一大批高等學府的專家學者，一直堅持以文言撰述，其中最著者如王國維、黃侃、吳虞、黃節、錢基博、汪國垣、劉永濟、陳寅恪等。在他們的影響下，教育界成了文言文最堅牢的據地，數十年來，古文承傳，薪火不絕。

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參與者如陳獨秀、胡適、魯迅、郁達夫、郭沫若、沈尹默、俞平伯、聞一多等早期人物，亦不時技癢，勒馬回韁，製作文言，其中頗有可觀之作。

三、抗日戰爭及內戰時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大批文人隨國民政府遷往內地，寓居重慶、成都、昆明、貴陽；亦有一部分人外流至香港、南洋；還有一些人滯留在敵占區南京、北平、上海等地。抗戰八年期間，國難當頭，人們已無心弄月吟風，整飾文字，與上一階段相比，文言文的勢頭顯然低落，但依然有人繼續創作，歌頌慷慨捐軀的英烈，指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悲憫民間百姓的疾苦。國統區大學師生堅持教學，不少文科學者如錢穆、錢鍾書、饒宗頤等仍用文言撰作。

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在敵占區中，文言文卻得到畸形的發展。汪偽政權以「復興中華文化」自

命，任用一些邃於舊學的文人如周作人、龍榆生、陳柱、李宣倜、錢仲聯等掌管文化教育機構，並出版《同聲》、《新亞國藝》、《中國詩刊》等刊物，時有文言文刊出。

抗戰結束，內戰又起，民不聊生，文學藝術更無足道矣。文言衰勢益甚，祇剩嶺南一隅之地，尚保留舊日詩文創作傳統。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十月，《廣東日報》文言副刊《嶺雅》，發表一大批粵籍文人的詩文，這已是中國大陸舊文化的迴光返照了。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九五〇—一九七六）

五十年代伊始，大陸的文化人面臨一場新的「文體革命」。一切文學都成了宣傳品，成了階級鬭爭的有力武器。被認為是「封建文化」象徵的文言，非但失去了官方的地位，更被排斥在社會各個領域之外。教育體制全盤改革，採用蘇聯模式。大學中文系中沒有現當代文言文的地位，文學研究者更是視之為「封建骸骨」，不屑一顧。二十多年間，文言創作似乎是一片空白，各種出版物中，當代文言文幾乎絕跡。早已潰不成軍的舊文化人，更是遯逃無地，一個個從山林、從市井被揪出來，成為專政的對象，他們，以及他們的作品被完全淘汰了。雖然如此，在民間，文言文尚維持一線生機，並在艱難發展，猶如谷底流泉，涓涓未絕。舊派文人如葉恭綽、胡先驕、馬宗霍、鄭逸梅、方孝岳、朱庸齋等時作短文序跋。從現存的資料來看，最大數量的文言作品當為文人的書牘和日記，這些文獻是珍貴的時代實錄，有待後人發掘和整理。八十年代，文藝復蘇，劫後餘生的老人們從塵篋中翻出少量舊稿發表，但已是明日黃花了。

最可稱異數的是，一九六一年，三年嚴重的「自然災害」之後，社會文化政策一度寬鬆，張伯駒時為吉林省博物館副館長，召集意趣相投的文人學者，居然私下組織「春遊社」，中有于省吾、黃公渚、陸丹林、黃君坦、羅繼祖、周汝昌、張江裁等知名人物，「每週一會，談笑之外，無論金石、書畫、考證、詞章、掌故、逸聞、風俗、遊覽，各隨書一則，錄之於冊，則積日成書」。這三百多篇短小的文言

文，終於在四十年後編成春遊瑣談一書出版，填補這段時期的空白。

臺灣、香港、澳門地區以及海外各國華人社區，似乎成了舊文人薈萃之地。廣州、上海、南京、北平以至全國各地一些傳統文化人，在政權更迭前夕，乘桴濟海。諸如潘重規、林尹、陳含光、高明、成惕軒、臺靜農、李晉芳、李漁叔、于大成等東渡鯤洋，黎國廉、劉景堂、曾克崑、趙尊岳、陳本、張斌、曾希穎、饒宗頤、羅忼烈、傅子餘、蘇文擢等留居港澳，李祁、周策縱、王叔岷等遠遊海外。他們數十年來堅持文言詩文創作，中華傳統文化，亦賴以一脈延綿。

五、改革開放時期（一九七七—二〇一一）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步入經濟建設的新時期。微陽初照，寒蟄昭蘇，百廢待舉。各地紛紛成立詩社，復出的老幹部以及文化教育界的高級知識分子，滿懷熱忱，重新寫作詩詞，並結集出版。在這時期，詩集的序跋成爲最常見的文言文體，作者多爲詩詞家或新文化人士，年青時未經嚴格的文言寫作訓練，於文言文的句法章法亦未考究，晚年好奇執筆，每以白話之法爲文言，氣格不純，加之以年事已高，才華衰退，故平庸之作多而精品少，與上輩文人相去甚遠，絕大多數祇能算是客串者而已。

進入二十一世紀，社會趨向多元化發展，傳統文化也受到普遍的重視。可慶幸的是，中青年學者已關注現當代文言文和詩詞，不少人還致力於創作實踐，網絡上時見發表，其中不乏佳作。大、中學生中不少人喜愛並嘗試寫作文言。民間動態更不可忽視，學童的古文、詩詞教育方興未艾，民間學者正在成長，並出版文言體裁的有分量的著作。

臺灣、香港地區，本是近半個世紀的文言文最堅固的營壘，近年隨著政局的更迭，教育制度的改變，加以老輩文人的日漸凋零，文言文創作已今不如昔，總體來說，亦似稍遜於大陸地區了。

二十世紀文言文文獻，祇有小部分作者有專集行世，而吉光片羽，每賴報刊雜誌以留存。較早有南社叢刻，收錄社員詩文稿，二三十年代以文言爲主的刊物有學衡、青鶴等，四十年代則有國藝、文史季

刊、嶺雅等。

學衡，吳宓主編。一九二二年一月創刊於南京東南大學，一九三三年停刊，計出七十九期。此刊以「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職志，辦刊目的是要證明「吾國文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每期有文苑、列文錄、詩錄、詞錄三子目，主要作者有胡先驕、柳詒徵、吳宓、吳芳吉、梁啟超、王國維、汪國垣、王易、林學衡、邵祖平、王澐、曹經沅、趙熙、向楚、龐俊、方守敦、方守彝、姚錫鈞、陳衡恪、李思純、林思進、葉玉森、黃節、陳寂、曾廣鈞、夏敬觀、曾樸、林損、陳曾壽、馬一浮、張爾田、朱祖謀、曾習經、陳寅恪、劉盼遂、陳三立、瞿宣穎、葉恭綽、繆鉞、鄧之誠等數十家。其中堅人物被稱為學衡派，皆為貫通中西的飽學之士，構成了當時中國的精英文化群體。

青鶴，陳瀛一主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創刊於上海，一九三七年七月，因抗戰爆發而終刊，計出一百一十四期。為同人刊物。創刊號刊布「本志特約撰述」共一百〇五人，有陳衍、丁福保、王尊農、劉承幹、梁鴻志、周瘦鵑、黃濬、傅增湘、孟森、章士釗、蔣維喬、夏仁虎、吳湖帆、冒廣生、于右任、錢基博、吳稚暉、高夢旦、陳巨來等一大批傑出的文人學者。是刊特重文獻保存，近代名人之日記、筆記、序跋、書札、年譜、詩文集，分期連載。被時人看成是舊文人絕地反擊、屈指可數的一塊陣地。

此外，還有一些大學文科學刊也採用文言。如三十年代中山大學中文系學刊文學雜誌，古直主編。每期均登載師生的文言詩文。

文史季刊，王易主編，國立中正大學出版。是刊一九四一年三月創刊，初擬每三個月發行一期，每年四期，合為一卷，然僅至第二卷第一期，即未再出版。是刊欄目，首學術論文，次文錄，次詩錄，次詞錄，次英詩選譯。作者有胡先驕、王易、吳宗慈、陳穎昆、蕭宗訓、涂世恩、王英瑜、陳樹人、王迪綱、歐陽祖經、程學恂、林學衡、張景煦、吳天聲、胡獻雅、周岸登、沈尹默、胡光燐諸家。

嶺雅週刊，陳寂主編，一九四八年五月三日創刊，計出七十期。原為廣東日報副刊，自四十五期

後，改爲中央日報副刊，傳靜庵主編。是刊主要分文錄、詩錄、詞錄三欄。作者主要是粵籍或寓粵人士，有詹安泰、吳三立、佟紹弼、陳湛銓、黃海章、吳天任、葉恭綽、李滄萍、陳寂、何曼叔、傳靜庵、陳荆鴻、方孝岳等數十家。

汪偽治下，又有國藝、學海、同聲等刊物，頗存此一特殊時期的文獻，似乎尚未得到當代學者應有的重視。

進入二十一世紀，民間刊物方興未艾。一群青年網絡詩人所創辦的留社叢刊，登載社友的文言詩文，品質頗高。中山大學嶺南詩詞研習社社刊粵雅，刊載本校師生的詩詞作品，也有一定數量的文言文。

近百年的文言文，已有人潛心收集，提供了良好的文獻基礎。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大東書局評注近代文讀本，編選者張廷華，已很有文學通變意識，他認爲選近代文與歷代文學合觀，「不獨可知近代文之軌則，淵源有自，且於新舊遞蛻之故，亦易明瞭」。（編輯大意）王文濡選編歷代詩文名篇評注讀本近代文卷，直接清文讀本之後，自清季以及民國，不拘宗派，以清眞雅正爲主。編者認爲，「文言文與語體文界限自別，稍涉俚俗，當在屏棄之列。惟文中沿用新名詞者，時代所限，習慣已成自然，且無古名詞足以代之，不得不寬例以收」。（編輯凡例）也注意到現代話語體系對傳統的駢古文的影響。羅維揚選編的現代文言（二〇〇八）搜集自康有爲、梁啓超開新文學之流別以來的通俗之文言，或曰現代通行的文言文，他把這種文言看成「是古代文言的延續和革新」，「是當今中學生大體可以讀懂的文言文，也是大學教授未必讀過的文言文」，「上溯梁啓超的新民體，近輯互聯網上的文言文，披沙揀金，遴選二十世紀和本世紀初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及海外華人所寫的優秀文言文一三九題，作爲範文，加以賞析」。（內容提要）。全書共分五卷，第一卷緒論，論述文言的好處和功勞、文言的進程和歧途、文言所受的衝擊以及當代國學復興導致文言綿互的問題，第二、三、四卷爲文選與講解，第五卷爲文體流變十講。但是，作者本非學界人士，又無親自操觚之能，所選大體祇能稱之爲帶有文言色彩的白話文，如曾